
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

魏宏运

抗日战争时期,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。集市刺激了根据地的生产,提供了军需,调剂了人民群众的物资联系,并战胜伪币,支持了抗日货币的流通,使根据地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。

集市是农民买卖、交换物资的场所,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和固定下来的。华北地区的一些集市,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唐代。明清时期,集市已经比较普遍。凡集市所在之地,即属该地区的商业中心。一般来讲,一个县总有几个或十几个集镇,集市大都设在镇上。平时,镇上有各种商号和店铺,日日营业。逢集之日,镇上摊商满街,农副产品上市骤增,方圆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赶集,卖出自己的农副产品,采购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集市有两天一集的,即逢单(日)或逢双(日),有三天一集的,也有五天一集的。有的地方分大集和小集,如逢三、八日为大集,四、五日为小集。大集有骡马上市。以太行山区麻田为例,三天一集,即逢一、四、七为集日;距麻田 20 里的桐峪逢三、六、九为集日;距麻田 30 里的索堡逢二、五、八为集日。冀鲁豫沙区的井店,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成集;袁大村二、六成集;千口四、八成集,逢十休息。从上述两个地区集市分布情况看,各有一个比较大的集市,集期较多,成为活跃地区商贸的主要场所。

抗战初期,由于日军入侵,华北许多集镇和集市均遭受不同程

度的破坏,人们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打乱了。大商号停止营业,将资金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,小商人也不敢露面,集市消失了。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,建立根据地,逐渐建立了相应的地方政权。各抗日民主政府,如太行山区和冀南的一些专区和县,都组建了商贸机构,组织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运销。太行区还成立了商贸总局。1941年改称边区生产贸易管理总局,以后又改建成晋冀鲁豫工商管理总局。各县设贸易局,许多贸易是通过集市进行的。最初几年,根据地大力发展合作社,1939年还推行合作社运动,希望以此解决供给、繁荣市面、流通货物、适当改善人民生活。但合作社并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,就是八路军的部分军粮和做服装的布匹也需要到集市去购买。人民生活离不开集市贸易。邓小平1943年在《太行分局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》一文中说:“我们党应该研究如何经过工商工作及市场关系,促进农民积蓄、帮助农业生产,以规定我们更具体的发展工商业市场的办法。”这清楚地表明了根据地对市场经济的认识。

在遭受日军封锁和分割的状态下,市场活动是与农业、手工业发展相适应的。市场反映着根据地的物质水平与力量。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,自力更生政策的贯彻,以及灵活统一的贸易政策,使根据地在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都有了发展。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是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政策,根据地多次召开生产会议和财经会议,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,努力实现这一政策。1940年6月初,第三行政区副专员李一清在和顺、昔阳、平定、榆次、太谷、寿阳六县士绅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发展经济。士绅们一致表示愿意参加抗日政府的各项建设,并决定首先恢复六县商业,以求抗日市场的繁荣。

《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》第1辑,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,第307页。

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,下同),1940年6月15日。

私人经济是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,将其纳入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轨道,是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共识,各县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如平定、昔阳和顺三县在1940年6月中旬召开的财经会议上决定:各县建立中心市场,奖励私人贸易,大量吸收必需品之输入,同时,县粮食局调剂物品,县合作社互相交换货物。7月,太北经济会议也作出决定,要求各县选择比较安全之中心地点设立集市,取消根据地内的税卡,不重复收税。对内实行保护贸易政策,吸收私人资本,鼓励私人商业,以调剂根据地内之市场。辽县更制定出恢复商业的具体步骤:以1940年7月为第一期,恢复抗战前商铺2/10;8月底为第二期,恢复3/10;9月底为第三期,恢复5/10。除此之外,还制定出各种奖励办法,如保障商人一切应享权利,减轻商人负担,确保商人在根据地内有自由收售山货、土货,自由运销之权;奖励商人投资工厂、合作社及与政府合资开发实业等;发动旧存货者复业,发动集股复业;函告客籍商人恢复旧业,使小摊逐渐变成商铺;对立即复业之各商户,由政府分别发给奖章奖状,以资奖励;大商户设立政治指导员,建立经常的会议制度,加强商人团结,提高商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认识,在政府统一经济政策下,繁荣根据地的市场。经过这一番推动,因战争破坏而衰落的根据地市场又复苏了。

二

抗日战争时期,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活跃经济、调剂余缺和支持抗战的重要作用。一些历史资料清楚地记录了其兴旺发展的繁荣景象:

武乡的洪水镇,是一个著名的集镇,方圆四五十里的农民都来此赶集,商洽交易的货物有榆社的粮食、黎城和左权的大牲畜以及

《新华日报》,1940年7月21日。

各种山货等。该镇集市恢复后，八路军和政府许多生产单位也参与了市场活动，在该镇开设店铺 30 多家。

偏城县是 1940 年新建的，由黎城和涉县各一部分组成。始建之时，全县没有一处象样的市场。而战前这里有繁华的集市，群众历来以柿子、核桃、花椒等山货从这里换取布、盐、油及日用品。在抗日政府的规划和倡导下，该地建立了饭铺 7 家、杂货铺 13 家、磨房 5 家、药铺 2 家、铁铺 1 家、染房 1 家、油房 1 家、豆腐房 1 家、粉条铺 1 家。

涉县河南店镇在抗战前很繁荣，有各类商号共 140 多家，包括布庄、染房、当铺、杂货铺和饭铺等，资金约十六七万元，隔日一集。交易最多的是粮食，最高额一集达 1 万元。襄垣、黎城、平顺、长治、长子、屯留等县的粮食经此地向路东大批远销，实为粮食集散地。抗战爆发后，该地商业几乎荡然无存。1941 年，边区政府逐渐恢复河南店镇市场。这时，居民已有 260 余户，以中小商人居多，有持商业执照的座商，也有无店面的游动小贩。至 1944 年，有 25 户财源大发。

涉县的索堡，抗战前有放帐的 8 家，资本 28 万元；绸缎庄 6 家，资本 2.5 万元；布庄 14 家，资本 1.4 万元；粮行杂货铺等 100 家，资本 70 多万元。抗日政府建立后，商户恢复发展到 150 多家，资本 170 多万元，经营者大都是过去的店员。

西营镇是襄垣县北部的一座古镇。镇上店铺林立。八路军在镇上开办了毛巾厂、纸厂、鞋厂、小煤矿，还有华兴隆、德兴恒等工商企业。每逢二、五、八集日，武乡、左权、榆社、黎城、涉县等地客商云集，生意兴旺。

屯留县张家镇是临屯路上一个重镇，交通便利，四通八达。后因日军汉奸之纷扰，市面日形萧条，1941 年 5 月前仅有杂货铺 3 家、油房 2 家、斗铺 1 家、饭铺 5 家、肉铺 2 家。自 8 月 14 日抗日政权恢复，正确地执行税务贸易政策，歇业商店纷纷恢复营业，市场顿趋繁荣。截至 9 月，全镇铺面，计有饭铺 16 家、杂货铺 15 家、油

房 3 家、斗铺 3 家、茶房 3 家、摊贩 5 家、理发馆 1 家、肉铺 3 家，与 5 月以前相比，增加了 3—5 倍。每逢集市，人民拥挤异常，贸易额达万元之谱。

平(顺)东鱼镇，每 10 天 3 集，是与冀西抗日根据地货物交易的中心地区之一，1940 年曾成立运销合作社 1 家、茶店 1 家、杂货铺 2 家、面铺 1 家、布店 3 家、食堂 1 家。1941 年 2 月 19 日，日军“扫荡”平东，市场遂被摧毁，损失万元以上。后经各界努力经营，市场渐转繁荣，计有运销合作社 1 家、植物油产销合作社 2 家、茶店 2 家、面铺 2 家、布店 11 家、盐摊 22 家、杂货铺 3 家、粮商 5 家、食堂 5 家、饭摊 15 家、估衣商 3 家、花贩 4 家、皮匠 1 家，每集交易额约在 4960 元之谱。

平(顺)北市场较战前大为发展。抗战前全县有私营工业 34 处，私营商业 142 处。战争初期逐渐衰落。1939 年仅留私营工业 7 处，私营商业 75 处。抗日民主政府执行新政策后，工商业即大量发展，1940 年有公营企业 3 处、私营企业 23 处、公营商业 2 处、私营商业 152 处。1941 年公营企业 8 处、私营企业 31 处、公营商业 13 处、私营商业 189 处。

武安的阳邑镇，地处山区、平原之间，居交通要冲，是货物集散地。抗战期间，驮运粮食的毛驴川流不息，每天有三五百头。该镇经商者有 3000 人，货物齐全，有“小上海”之誉。交易以山货和粮食为主，因客流量大，饭店亦多。据统计，当时有山货栈 20 多家，棉布杂货店 40 多家。民主政府和部队经营的有“永贸昌”、“经营处”、“实业公司”、“泰记货栈”等。“永贸昌”经销布匹、纸张、食盐等；“经营处”经销杂货、羊毛线、毯、皮货、碗等日用品；“实业公司”隶属一二九师后勤部，经营药品兼搞一些科研。私人商店有“庆丰祥”、“庆

《新华日报》，1941 年 12 月 3 日。

《新华日报》，1942 年 1 月 14 日。

《新华日报》，1942 年 1 月 18 日。

丰玉”，都是经营桃仁、棉饼、花椒的。私人开设的山货栈有“同流货栈”、“信承店”、“永盛店”、“乱石岩行店”、“三盛公行店”、“华凤祥”等 24 家。阳邑东池和西池有粮食市，粮店和粮站有“公义斗”、“老心”、“侯有的”等 12 家。经营洋布的有“安振兴”、“聚盛成”、“豆大良”、“孟令会”、“三斜的”、“孟虎林”等字号；杂货铺有“德聚成”、“德源和”、“聚素成”、“五和兴”等；此外，还有饭店、肉铺、蒸馍铺、木匠铁匠铺、理发铺等多家。以上列举的行业，经营方式比较原始，但每逢集日，摊贩栉比，粮食、蔬菜、土布、小型农具、镰刀铁耙、干鲜果品等应有尽有，方圆二三十里的人们都来赶集。

民主政权重视发展农业经济，传统的物资交流大会从未停止过。如阳邑镇一年一度的东桥大会就倍受欢迎。1942 年 3 月 21 日至 24 日，正当春耕序幕拉开之际，大会上牲畜、农具、种子及其它各种物品齐全。东桥广场内有星罗棋布的露天食堂，牲畜市场拥挤着成群的牛、马、骡、驴和大猪小猪；农具市场陈列着犁、耩、筐、担、耙、罗、锯、锹、锄、瓮、缶、锅、勺等。街道的两旁，排列着土布市场、棉花市场、粮食市场及其它市场。这样的交流大会每日贸易平均总额较 2 月份反扫荡以前，激增 5 倍以上。辽县春耕调剂委员会几乎同一时间也组织了拐儿镇骡马大会。赶会的人熙熙攘攘，异常热闹，每天约 2500 余人，其中还有来自辽县以外的。牲畜交易 130 余头，农具数百件，价格很低廉，群众竞相购买。

农村集市贸易的贸易范围，本来就比较狭窄，战争环境中集市交流的商品更加显示出本地特色。太行区的农作物主要是小米、麻、烟、玉蜀黍，副产品有花椒、红枣、柿子、核桃、茶叶、药材、皮毛、猪鬃等，集市交易也以这些产品为主。太岳区的物产为粮食、棉花、麻、烟，除棉花不能自给外，其余的均有剩余可供输出。副产品有木材、皮毛、猪鬃、桃仁、鸡蛋等。手工业品有铁货、榨油、卷烟、瓷窑

据武安图书馆郭素琴同志提供史料。
《新华日报》，1942 年 3 月 31 日。

货、熬硝等。这类物品在市场上显得很丰富。冀南区农作物以棉花、小麦、花生为主，没有特殊的山货，硝盐却很多。农民取土淋盐，既可得盐，又可得硝。这种盐有点苦味，在日军封锁海盐之后，成了人们的食用盐。冀南手工业比较发达，毛巾、榨油、卷烟、丝袜、编席等家庭副业产品，丰富了市场。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位于大平原上，生产小麦、黄豆、高粱、棉花、白麻、烟叶等，物产丰富，饲养繁殖家畜的很多，除了马、牛、羊以外，还有家禽。由于耕牛多，贩运牲口成为当地的一种传统副业，也成为其他地区解决耕牛问题的最大来源。在这里，山羊皮、白羊皮、羊毛、猪鬃、牛皮是输出的大宗物品。织布、熬硝、榨油、制草帽、造纸、酿酒者也很普遍。也有自制火柴的，但尚不能自给。

和抗战前相比，原来从大城市运来销售的东西没有了，如绫罗绸缎、京广杂货等很难找到，土特产却得到猛烈的发展。各集市之间的联系，只要没有敌人扫荡，仍旧照常，如阳邑、索堡、南委泉、西营、桐峪、洪水等地。私人资本力量，虽然没有达到抗战前的状态，却也很可观。当时出版的《工商通讯》第14期刊载一篇文章，题为《1943年第二分区工商业》，包含着丰富的内容，表述了根据地的商业面貌。二分区是指榆社、武乡、和顺等县。文中讲到：“商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，去年全分区只有座商34家，行商摊贩245家。新年新设的就有座商144家，行商摊贩882家。从资本上来看，去年共拥有资金239400元，今年共拥有2085150.5元，这对根据地市场的繁荣，根据地物资交流，农村经济的活跃，本币值的巩固与发展，及输出入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在群众必需品的供给上，山土货的输出与必需品的吸收上，他们占比重是很大的，特别是那些山土货的点滴输出，几乎都是他们的功劳。同时由于他们的发展，使冀钞在二分区踢开了狭小的圈子，从游击根据地与游击区把伪钞驱逐出去，或逐渐驱逐着，从经济上巩固以往反蚕食斗争的胜利，并使得敌占区人民逐渐割断经济上对敌人的依赖而面向我们。”这是对内坚持贸易自由的结果。

在根据地内,粮食交易是集市最重要的经济活动。为便利根据地村庄人民购买和出售粮食,六专区各县及涉县、阳邑、沙洛、禅房、浆水、索堡、西水等地均设立了粮食集市。

在游击区,则创造了流动市场,其特点是交易进行得异常迅速,定时而聚,定时而散,转眼工夫已带着各自换来的东西转回归途。也有的集市从集镇移到小村庄,如冀鲁豫沙区著名的集市井店,粮食上市时,每集平均 600 石至 700 石,最多时约 1000 石;棉花每集平均上市 1 万斤至 2 万斤,最多时约 3 万斤;牲口每集平均上市 100 头至 200 头;枣子每集平均上市 60 石至 70 石。市场常年繁荣,昼夜忙碌,各行日日有成交。为缩小目标,后来这一集市游动到附近村庄,保证了物资交流的继续进行。

游击根据地的集市,经常有遭受敌人扫荡、摧残的可能,因此很难稳定。抗日力量增强时,敌伪力量就会潜伏起来。

焦儿寨是濮阳游击根据地的中心集市,在贸易上是濮、昆两县往白道口走私的要道和汇合点。濮、昆粮食往西北走私,白道口的大盐、纸烟等都在这个中心集市交换后分散各地。焦儿寨逢双日成集,有粮行 25 家,每集从东南来粮,上市有 500 石左右,销往梁庄、井店各集,大多数转白道口走私出境。花布市有花摊 6 个,每集由西北来棉花上市 200 余斤。牲口行每集大约上市 200 余头,二分之一销往东南换回粮食。干果行每集上市枣子 25 石左右。对如此重要的集市,民主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控制,驱逐了敌伪势力,也断绝了利用市场资敌的现象。

为防止敌人对集市的突然袭击,根据地创造了一种消息树,在集市附近较高的地方,竖起一种传递消息的树标。如果侦察到敌伪来骚扰,就把消息树放倒。人们见树一倒,立即分散躲匿,一村看一村,各村的消息树相继倒下,连牛骡马也跟着跑,没有吼叫之声。

见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》(河南部分)四,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,第 456 页。

根据地的集市是分散的、自由的,同时又是统一的、有组织的,在经济运转中形成了自己的力量。

三

根据地在发展集市贸易中,有不少成功的经验,有创造有发明,有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方法。

在重新恢复和创建集市时,商界联合会也随即组成了。新的商界没有放帐盈利的钱庄,没有当铺,没有集市上的经纪人,这些都从市场上消失了。管理市场的是交易所。交易所随着市场的繁荣不断强化其职能。一般情况下,交易所设主任1人,总会计1人,各行管理员若干。这是抗日民主政府管理市场的唯一机构,也是工商局最下层的细胞组织,既负有组织、管理市场,加速农村商品交换,打击敌伪掠夺物资等方面的使命,也负有稳定物价,巩固币值,保护贸易的责任。

交易所建立后,集市上的一切都有秩序地进行。如在县城,就分设粮食、棉花、土布、牲口等交易所。交易所还负有保护集市安全和人民财产的责任。

粮食和棉花是集市交易的大宗,抗日民主政府极力控制这类商品。关于粮食,为防止敌人掠夺,保证抗日军民食粮供给,从1942年1月起,在一些地区实行了专卖制度。专卖并不是定官价,而是由专卖行收购,根据地内仍实行自由交易。供过于求时,专卖行以市价收买;求过于供时,专卖行则出售存粮,以平衡市价。凡设有粮食专卖行的地区,粮食交易均须经过专卖行始能进行。根据地的粮食供应问题,经过大生产运动,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。至于棉花的供应,因为关系到军用民需及纺织事业的发展,政府极力在大小集市吸收,每一区都分配了吸收数目。以后,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增强和根据地的扩大,平汉沿线广大棉区获得解放,为吸收棉花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根据地很注意开拓自己的市场。1939年根据地内还存在相互封锁的现象。1940年8月1日,冀南、太行、太岳三大区成立“冀太联办”,负责统筹三大区的贸易交流。各区互通有无,货畅其流。如冀南与太行间的交流,冀南输出土布、棉、盐,太行运出铁器、药品、麻绳、山货;太岳区将小米、小麦、大豆、油料、牲畜等运往外地,又把外地的铁器、农具、棉花、布匹、食盐、皮货等商品运到太岳。另外,白晋铁路沿线与平汉铁路沿线间的交流也很顺畅。白晋方面经太行运平汉线粮、油、麻,平汉线经太行运盐及日常生活用品至白晋线。中国古代的商路,如长治到涉县间的运输,人背、车拉、牲口驮,络绎不绝,形成了一个运输网。

在抗战期间,物价总趋势不断上涨。根据地受到敌人封锁、扫荡和国民党反共潮流的影响,商品价格几次出现波动。譬如1940年1月中旬,晋东南各地物价急剧高涨。就太北地区而言,一日数市,价格跳跃式上升。小米每斗4元有奇,白面每斤3角以上,较平日超出3倍。毛巾、肥皂、布匹价格也比以前升腾两倍,市场动荡不安。根据地地方政府立即邀请当地驻军和民众团体代表暨地方公正绅商,组成评定物价委员会,将各种主要商品,特别是粮食等民生必需品之价格,作一公正的评价,通令市场按此价格出售商品,不得擅自抬高物价,投机渔利。同时,由军政民联合组织检查队或纠察队,逢节、逢集轮流分赴各镇市检查,监督市场买卖,防范一切违禁行为。1943年12月上旬,根据地各地物价平均上涨一倍,市场顿时出现紊乱现象,发生许多反常情况,如索堡麦子向桐峪流,平顺小米向北社流,卖价低于买价。此时,边区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,组织全部山货出口,紧缩商业贷款,调拨大批粮食作调剂平稳之用。这些政策都是通过市场交易所实施的。交易所召集商人座谈,平抑物价,使社会很快安定下来。

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,经济来往不可避免。敌人千方百计破坏根据地贸易,以扩大其经济占领范围,对各接壤区的集市,不断实施武力袭击与压迫,破坏各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,同时大量

倾销奢侈品,企图控制根据地集市。在这种形势下,若没有对外贸易战的意识,就会使根据地遭受灾祸。因此,根据地制定了贸易政策,有计划地输出和输入,通过山货输出,换回根据地所需的物品,力求出入口平衡,使之有利于根据地。对外贸易则采取了统制办法,无论机关企业、公营商店、合作社以及私人商店,与敌区经纪人接洽贸易,必须经过当地工商局办理,不允许直接洽谈。这一规定不等于出入口货物必须由公营商店包办,合作社和私人等都可以对外出入口、交换货物,但手续必须统一。至于出口、换回什么货物,须根据现实情况由政府决定。

在对敌贸易中也出现过一些不良现象。1941年春,各部队军营合作社为了赚钱获利,从敌占区运进大批日货,到处销售。这些日货大部并非军人必需品,或普通人民的日用品,而是奢侈品。这不仅使根据地法币源源流出,入超的数目日益增加,影响了根据地的财政金融,也容易给敌人经济侵略造成可乘之机。此外,还有不少军营或其他合作社的采办人员,以军用品名义为掩护,拒绝纳税,包庇走私。更有甚者,少数合作社采办人员竟假借或利用军队、政府的名义,贩运违禁品。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有鉴于此,于1941年5月1日向所属各兵团发出训令,指示发起全华北抵制仇货运动。自5月28日至6月3日为抵抗仇货运动周,由军政机关、贸易局、商联合会共同组成检查队,检查各合作社、商号、小摊贩是否仍有运销仇货、奢侈品与违禁品者。辽县商界积极响应号召,制定出一些具体办法:如7天检查一次;限6月底将所有仇货拍卖净尽,如到期尚未卖完者,报商界联合会另行规定处理;另召各商户各制木牌一块,树在自己门外,上写“我们不卖仇货,卖仇货是我们的耻辱”等。该县各重要市镇还于1941年5月24日成立了对敌经济斗争研究会。抵制仇货运动的开展,不仅清除了敌货,粉碎了敌人的经济进攻,还提高了军民的民族意识,市场也因此巩固了。

《新华日报》,1941年5月17日。

集市贸易是在与敌斗争中发展的。敌人曾企图占有根据地市场,但是失败了。根据地市场深深扎根于根据地军民生活之中,他们用一切力量保卫着自己的市场。

市场的日益巩固,还可以从货币的流通鲜明地显示出来。

1939年晋冀豫根据地成立了自己的银行,发行的钞票称冀钞。冀钞开始在市场出现时,有人接受,也有人持怀疑态度。新面孔的钞票,印刷又不精致,再加上旧势力的对抗及敌人的谣言,增加了冀钞流通的困难。冀南银行为取得群众信任,树立冀钞本位币的形象,于1940年8月在西井镇举办了储备展览,展出了黄金和法币,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基础。

1940年7月,晋鲁豫边区为统一境内货币,确定冀钞为边区本位币,决定在市场上驱逐杂钞,保护法币、银洋。各大市镇都设立了银行机构,通过贷款、收购杂钞、打击伪钞,使冀钞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。同年11月,晋察冀银行、山东北海银行、冀南银行、晋西北的西北农民银行、陕甘宁边区银行五行实行通汇,加强了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经济联系,提高了冀钞在全华北的地位。以后,尽管敌人不断扫荡,破坏根据地集市,在有的地方缩小冀钞的流通,个别地区银洋、法币仍在暗中行使,但冀钞占领市场是不可逆转的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混合的货币市场逐渐变成单一的冀钞市场。冀钞深得人民拥护。如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每月平均提出10多万元,投到商业和生产事业特别是农业中去。1941年武乡全县到处是纺织声,全边区到处开着骡马大会,这都是冀南银行贷款的结果。太谷城里可以直接用冀钞买到东西,贸易往来比过去增加10倍。老百姓都争着要冀钞,和东敌占区人民经常越过封锁线到抗日政府兑换冀钞。日军对冀钞的日趋巩固无可奈何,便极力压低冀钞的比价。在太岳区,敌人强迫规定1元冀钞顶1角伪钞。在太行区,沿平汉线一带,敌人利用晋察冀边币来打击冀钞。漳河两岸敌人想把伪钞同银元联系,破坏冀钞本位币的作用。在各地区,敌人还大量收买冀钞,然后使冀钞在一定地区膨胀起来,降低冀钞价格。在敌

人占据的城市内,谁携带冀钞就有被残杀的危险。为了反击敌人的经济侵略,根据地集中一切对敌经济斗争力量,统一对敌经济斗争的指挥与作战,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。诸如1941年5月10日公布了《晋冀豫区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》,规定商民凡存有伪钞者,统限于5月底以前向所在抗日县政府申请贬值兑换冀钞;游击区或接敌区限于6月底以前向该管抗日县政府申请贬值兑换冀钞,不得再行使用和保存伪币,如发现使用伪币,一定追究,依法惩办;在接敌区展开同敌人争夺游击市场的斗争,打击敌人的黑市场,加强缉私工作,掀起群众缉私运动;规定向敌占区运销土货、山货必须保证换回等价的必需品;统一对外采购,掌握外汇,压低伪钞,使外汇不为投机家、发国难财的人所利用。如林北加紧经济战,于1941年8月成立了对敌经济斗争委员会,其任务是:1. 加强对外贸易统制;2. 组织对敌货币斗争;3. 组织统一采购委员会。这种斗争是长期的。巩固金融阵地,保证抗日本币,打击敌伪货币,是根据地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没有经济力量作后盾,根据地就难以存在。如果考察这时抗日民主政府公布的有关政策,就会发现:根据地确实集中了一切智慧,进行着令人敬佩的壮丽事业。它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,而是在竭尽全力奋战。

事情的发展与敌人的意愿相反,伪联券不是增值,而是贬值了。1942年底,第一分区获鹿赞金一带敌占区伪钞狂跌,物价飞涨,并且逐渐向南延伸。老百姓纷纷推出伪钞,换成冀钞,或购成货物保存。1943年,根据地提出“打倒伪币,提高冀钞”的口号。随着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扩大,伪钞的流通地区和使用范围日益缩小。到1944年底,冀南票和伪联券的比值已达到1:1.1元,根据地取得了经济斗争的胜利。

四

根据地在恢复、创建和发展集市过程中,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

心,以发展生产、掌握物资为坐标。值得称赞的是,根据地的领导者在认识上把生产和贸易统一起来。各级政府不断研究发展农业、工业,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有历史基础的手工业,如纺织、造纸、铁业等,奖励私人营业,奖励发明,欢迎外来投资。这一思路把根据地经济引向正确发展的轨道,大大推进了抗日事业的发展。

由于重视农业,提供大量贷款,使农业有了好收成,因而出现了集市的繁荣,农具、农产品应有尽有,极为丰富。太行区的山货,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如桃仁,年产达五六百万斤,花椒在300万斤以上,党参药材漫山遍谷都是,杏仁、柿饼、红枣、栗子之类,产量也很丰富,还有猪鬃、毛皮、蜂蜜、蚕丝等都是出口的大宗,每年输出额都很大。因为奖励小工业、手工业的发展,鞋、纸烟、伞、食物、皮革等转为私营,政府集中力量发展主要工业。毛织、炼盐、榨油、造纸等生产在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共同努力下,都开展起来,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。

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重视人才、重视技术。1942年1月,边区政府曾通令各县,登记长于农林、牧殖、工矿等业的专门技术人才,以便设法聘请,共同进行经济建设事业。只有各项建设都得到发展,市场经济才能兴旺起来。根据地的领导者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在残酷的战争中,敌后根据地军民勤劳猛进,市场经济蓬勃发展,充溢着活力。这是历史的奇迹。这说明中华民族是最经得起灾难、最勇于创造的民族。

(作者单位:南开大学历史系)

(责任编辑:荣维木)

《新华日报》,1942年1月30日。